

# 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

王 美 华

内容提要：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乡饮酒礼的“宾贡”职能一度凸现，“宾贡”仪式独占了乡饮酒礼之名，而“尊德尚齿”的乡饮仪式则名为正齿位。此后，“宾贡”乡饮酒礼逐步转化为科举制的配套仪式“鹿鸣宴”，进而脱离乡饮酒礼的范畴。在此过程中，乡饮酒礼渐趋缩小为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社会的礼仪仪式，并进一步发展为地方儒林盛事，在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乡饮酒礼 鹿鸣宴 宾贡 尊德尚齿

乡饮酒礼为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礼仪，从先秦直至明清，始终未脱离人们的视线。尤其是明清时期，乡饮酒礼在建立基层社会秩序、推行礼仪教化方面的作用，更加受到关注。然乡饮酒礼自先秦礼文到明清时期基层社会中的推行实践，却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代乡饮酒礼的“宾贤”功能一度凸现，进而演化成为贡举鹿鸣宴，自乡饮酒礼范畴中脱离出去，乡饮酒礼逐步定位于基层社会组织中“尊德尚齿”的宴饮仪式。这种变化正是在唐宋时期。

关于中国古代乡饮酒礼的仪制，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例如，杨宽论述过乡饮酒礼的特点、起源及其功用等<sup>①</sup>，余嘉锡探讨过汉晋间乡饮酒礼实施情况。<sup>②</sup>此外，姚伟钧、曾佩芬亦对乡饮酒礼的源起、仪式化及其形式、作用意义进行过论述，等。<sup>③</sup>对唐、宋时期的乡饮酒礼，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高明士在针对隋唐教育制度、贡举制度的研究论述中，对隋唐乡饮酒礼制度多有讨论，特别是曾专门撰文重点探讨过隋唐乡饮酒礼的建制过程、乡饮酒礼的内容包括实施对象与地点、行礼的时间和具体实施的礼仪等，是有关隋唐建制和实施乡饮酒礼研究的重要论著。<sup>④</sup>曾我部静雄则由中

① 杨宽 《“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1964年；修订稿收入氏著《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0—309页。

② 余嘉锡：《晋书疏证》，《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23—159页。

③ 姚伟钧：《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22页。曾佩芬：《乡饮酒礼的源流及其社会功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

④ 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唐史论丛》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国古礼所见之乡饮酒礼入手,探讨唐代的乡饮酒礼与日本的乡饮酒礼,并由此进一步论述日本的贵族政治。<sup>①</sup>游自勇也对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发展演变作过研究,提出了乡饮酒礼在汉唐时期地位不断提升,最终进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礼典,完成了礼制化过程。<sup>②</sup>此外,申万里也讨论过宋、元两代的乡饮酒施行情况,<sup>③</sup>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唐、宋时期乡饮酒礼的研究成果,或者以汉唐为研究时段,或者以隋唐为研究时段,亦有以宋元作为研究目标,惟其对乡饮酒礼在唐宋时期演变的关注明显阙略,尤其针对由唐至宋鹿鸣宴自乡饮酒礼概念范畴中剥离的问题更是尚未引起注意。本文正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贯通唐宋的“长时段”为视角,力求清晰地梳理乡饮酒礼的演变脉络,以深入分析唐宋礼制发展的趋势特征。

## 一 “宾贡”职能的凸显与正齿位礼的独立： 唐代乡饮酒礼的演变

乡饮酒礼本为周代行之于乡学之中的宴饮礼节,实际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中,以正齿、尊长和养老等为主旨。周代乡饮酒礼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手段,行于乡学之中,另外也有天子举行于国都辟雍者,但并不非常态。今人所见乡饮酒礼文载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以及《周礼·地官乡大夫》等典籍之中。根据《仪礼·乡饮酒礼》,其仪节大致包括:请迎宾客之礼(谋宾、戒宾、速宾、迎宾之礼)、献宾之礼(主宾之间的献、酢、酬,主介之间的献、酢,主人献众宾)、作乐(升歌、笙奏、间歌、合乐)、旅酬、无算爵及无算乐、送宾及其他。上述礼节之中,以献宾之礼为最重要,用来表示对宾客的尊敬。<sup>④</sup>至于乡饮酒礼举行的时间,《仪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义》语焉不详。唐孔颖达著《礼记正义》认为:周代乡饮酒礼在四种情况下举行,一则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四则党正蜡祭饮酒。<sup>⑤</sup>按此,乡饮酒礼的举行时间,三年大比之时举行宾贤能之礼,常在正月;州长习射饮酒,于春秋行之;党正饮酒以正齿位则是在季冬(十二月)蜡祭之时;唯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则似无常时。由此推之,“乡则三年一饮,州则一年再饮,党则一年一饮”<sup>⑥</sup>。然周代乡饮酒礼是否全按此举行,因

① [日]曾我部静雄:《日唐の乡饮酒の礼と贵族政治》,《律令を中心とした日中关系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564—583页。

②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汉学研究》22卷2期,2004年,第245—270页。

③ 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28—36页。

④ 关于乡饮酒礼的起源和仪式,可参见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以及姚伟钧《乡饮酒礼探微》等文。

⑤ 《礼记正义》卷六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2页。

⑥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24页。

文献记载的缺略而不能得知。杨宽即认为：孔颖达此论乃根据《周礼》立说，周代是否按此实行，实有可疑。<sup>①</sup>

周人重视乡饮酒礼，孔子亦曾云：“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乡饮酒礼而能教化推行、礼行于乡，皆在于乡饮酒礼具有“宾贤能”与“尚齿”这两项基本的功能。贾公彦引郑玄注云：乡饮酒礼乃“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sup>②</sup>孙希旦《礼记集解》之“乡饮酒义”中亦云：《礼记·乡饮酒义》本自《仪礼·乡饮酒礼》，而《仪礼》所据“是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之礼也”。亦明确指出乡饮酒礼为“宾贤之礼”。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乡饮酒义》在引《仪礼·乡饮酒礼》之文而“释之”后，却在阐发乡饮酒“礼义”之际，明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sup>③</sup>等仪节，以“专明党正正齿位之礼”<sup>④</sup>。显然，其所阐发的乡饮酒的“礼义”重点不在于宾贤能，而重点在于突出明尊长、明养老以成孝悌。通过乡饮酒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等仪节使民知尊长养老、明尊卑长幼之序，以维持统治秩序。

周人是否如孔颖达之说定时举行乡饮酒礼，尚有可疑，但是乡饮酒礼文因载入三礼典籍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却是毋庸置疑。尤其推行乡饮酒礼明尊卑长幼之序、尊老尚齿以成孝悌的礼义，因为《礼记·乡饮酒义》的着重阐发而得到更多的关注。例如，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论辩者即有曰“乡饮酒之礼，耆老异饌，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sup>⑤</sup>《白虎通德论》卷上《乡射》亦云：“所以十月行乡饮酒之礼何？所（以）复尊卑长幼之义。春夏事急，浚井次墙，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闲暇，复长幼之序也。”东汉时地方郡国学校十月举行乡饮酒礼，遵循的正是尊老尚齿、明长幼之序以正齿位之说。<sup>⑥</sup>西晋武帝、惠帝时曾亲自于辟雍举行乡饮酒礼，咸宁三年皇太子蒞临辟雍，亦行乡饮酒礼。西晋中央辟雍举行乡饮酒礼，所强调的正是尊卑长幼的秩序，“表明统治者对这种礼仪的重视和对其社会功能的肯定”<sup>⑦</sup>。北魏

① 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指出，孔颖达所认为的乡饮酒礼在四种情况下举行，“都是根据《周礼》立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第285页）。此外，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也认为：礼经所见的乡饮酒礼在先秦是否成为一种稳定的礼制，其可信程度有多大，由于《三礼》的作者和成书过程一直存在争议，所以只能把它当作是儒家提出的一种理想，而成为后世效法的渊源所在。

② 《仪礼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本，第980页。

③ 孙希旦：《礼记集解》，第428页。

④ 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424页。

⑤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三《未通》，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2页。

⑥ 关于东汉地方郡国学校举行乡饮酒礼的论述，可参见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和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等文。

⑦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

建国,太和十一年十月曾颁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sup>①</sup>其诏文正表明推行乡饮礼以教民知尊老正齿、明尊卑长幼之序。隋初定制,国子寺“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sup>②</sup>显然,隋初在兼采北齐以及南朝齐、梁礼制之际,也整合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国子寺(隋代中央无辟雍)和地方州郡县学校岁行乡饮酒礼,以尊老尚齿,成为常典。<sup>③</sup>

汉代以来,乡饮酒礼“尊老尚齿”之意始终得到关注,而另一方面,乡饮酒“宾贤”之意也并未被忽略遗弃。汉代州郡举送人才之时,即有“以礼发遣”的仪式,正是周代乡饮酒礼“宾贤能”之意的延续。<sup>④</sup>至于隋代,开皇七年实施贡举时,又规定各州贡士须于州学举行“宾贡之礼”<sup>⑤</sup>。而此亦显然秉承周代乡饮酒礼之“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的礼义,是地方贡士之时举行的“宾贤能”的礼仪。<sup>⑥</sup>由此而言,汉代以来,乡饮酒礼“尊老尚齿”和“宾贤能”这两种礼义都得到了延续。然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由汉至隋,无论是东汉以下举士“以礼发遣”,还是隋代贡举之际的“宾贡之礼”,同样未明确称其礼为“乡饮酒”。而文献中所称之乡饮酒礼者,皆为“尊老尚齿”之仪式。显然,这表明汉隋之际乡饮酒礼“尊老尚齿”之礼仪在事实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是否可以由此推测,汉代以来“乡饮酒”已经更倾向于“尊老尚齿”之意了呢?

乡饮酒礼在唐初即得到重视。唐太宗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情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革兹俗弊“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要求州县长官每年“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

① 《魏书》卷七下《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163页。

② 《隋书》卷九《礼仪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页。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这是对学校(中央及地方学校)学礼所作的基本规定,至迟当定于开皇二年令。

③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认为,隋代的调整其实是采用了一种折衷的方式,既承认了西晋“违古”的事实并使其合法化,同时又遵循地方举行乡饮酒礼的古制。

④ 曾佩芬《乡饮酒礼的源流及其社会功能》认为,从东汉以下举用人才时若干“以礼发遣”的记载,推测乡饮酒礼与科举的密切结合,“并非突然产生,而是从周朝贡士宾兴饮酒以来,即有长久不绝的渊源”(转引自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

⑤ 据《隋书·梁彦光传》载,开皇中,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常设饌,其余并坐廊下”。“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第1675—1676页)。

⑥ 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此举也就将各州贡士与州学乡饮酒礼相结合,虽然在实施贡举以前,各州也可在察举制度下荐举人才时进行乡饮酒礼,但是进行时间较不明确,难言制度化,亦乏实例可举。

之。庶乎时识廉耻，人知敬让”<sup>①</sup>。贞观六年颁行的乡饮酒礼是“询诸旧章”，可能是录自先秦礼仪，亦或参以隋代之制。<sup>②</sup>以针对乡间鄙俗，在乡里闾里推行教化，使长幼齿别有序，人知敬让。

又据《新唐书·韩思彦附韩琬传》记载，韩琬举茂才，名动里中，“刺史行乡饮饯之，主人扬觶曰：‘孝于家，忠于国，今始充赋，请行无算爵。’儒林荣之。”韩琬举茂才，刺史“行乡饮饯之”，此仪式当与隋代“宾贡之礼”相同，有宾贤能、以礼发遣之意。韩思彦为高宗时人，韩琬举茂才时间可能在武则天时期。韩琬举茂才，州的最高长官刺史行乡饮饯行，这是让读书人感到荣耀的仪式。据《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云：“长安二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新唐书·选举志上》亦记载：长安二年，武则天始置武举，其中举者“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显然在长安二年设立武举之前，乡饮酒礼“宾贤能”之礼义就已与科举贡士结合在一起了，唐代地方已经在贡举人时举行乡饮酒礼饯行之制了。或者可以认为，隋代“宾贡”亦即是唐代乡饮酒贡士之滥觞。其仪式，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另从韩琬的事例中，还可以看到，有主人扬觶赞辞，以示庆贺。这种突出“宾贡”饯行之意的仪式与贞观六年诏令中强调的“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的仪式有着明显差别，但是，二者皆明确称为“乡饮酒礼”，这与汉隋时期又显然不同。这一局面的出现，就容易使人产生疑惑：是否这就表明贞观六年颁行的乡饮酒礼至此已经发生变化了呢？<sup>③</sup>之所以容易产生这样疑惑，在于唐隆元年，朝廷再次颁发了推行乡饮酒礼的诏令。睿宗复位不久，即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乡饮酒礼之废，为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酒礼。”<sup>④</sup>要求各州遵行乡饮酒礼。另《诫励风俗敕》中亦云“乡饮礼废，为日已久，尊德尚齿，弘益极深，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令有劝慕。”<sup>⑤</sup>此中所指乃是乡饮酒礼推行效果不好，因此在朝廷意图诫励风俗重建秩序之

① 《唐会要》卷二六《乡饮酒》，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98页。

②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认为，此《乡饮酒礼》一卷，可以推测是损益《仪礼》所载而成。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此乡饮酒礼制“当来自隋礼（开皇礼），间接或来自先秦礼经（《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详情不明，至少不是贞观新编而成的礼仪。”

③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认为“上距贞观年间并不远，或许太宗的诏令得到了贯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例子明确表明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已经和太宗时期有了重大的转变，是与贡举联系在一起了。”

④ 《唐会要》卷二六《乡饮酒》，第498页。

⑤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70页。又《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一九《申劝礼俗敕》，云“乡饮礼废，为日已久，尊德尚齿，弘益极深，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令有劝慕”（第222页）。

际,才会再强调乡饮酒。敕文明确强调“尊德尚齿”,却并未言及贡举,似与贡举之际“宾贡”钱行之乡饮酒又不相同。及开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唐玄宗颁诏云:“初颁乡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sup>①</sup>言“初颁”,则此礼仪当为新编。此次颁行亦未言及贡举。我们注意到,开元六年诏令规定每年十二月即季冬之月举行乡饮酒仪,如前文所述,《周礼》中已有党正季冬(十二月)蜡祭之时饮酒以正齿位之说,开元六年诏令显然由此而来。也恰恰是这一时间规定,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辨析此前同称为“乡饮酒礼”者,其实质却是“尚齿”与“宾贡”二者轮番出现的混扰。“每年十二月行之”,这一时间与唐代诸州贡举的时间截然分开。唐制,贡举是以州为发遣单位,举子考试合格后,“每年十月随物入贡”<sup>②</sup>。诸州乡贡举子,由朝集使贡于尚书省,这就是随物入贡。<sup>③</sup>按《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规定,凡天下朝集使皆须在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城,十一月一日赴朝见。由此推断,诸州“宾贡”钱行的乡饮酒礼需要在十月初甚至在十月之前举行,尤其是南方诸州,路途遥远,“宾贡”时间可能更早。<sup>④</sup>因此,开元六年颁布的“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的乡饮酒礼,显然与诸州“宾贡”钱行无关,而是对应贞观六年诏令中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的尊老尚齿的仪式。

针对唐前期乡饮酒礼“尚齿”与“宾贡”二者,有学者指出,形势不同侧重点也就不同。<sup>⑤</sup>此观点显然不能解释这样的事情,开元六年诏令乡饮酒礼“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而开元十九年四月又诏“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sup>⑥</sup>。在强调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式的同时,朝廷仍在执行诸州宾贡的乡饮仪式。由此而言,唐初以来的乡饮酒礼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两个路线或者说两种思路,这也是对汉代以来乡饮酒礼“宾贡”与“正齿”两种礼义的延续。一是“以礼发遣”的宾贡之礼,诸州行乡饮钱送乡贡;二是遵循“尊德尚齿”礼义,州县举行乡饮以劝导孝悌。“宾贡”与“尚齿”两种仪式,是同时存在的,虽皆称以“乡饮酒礼”,实质却是“同名异实”。由此来考虑,唐代有关“乡饮酒礼”的诏令或事例中忽而以“尊德尚齿”为

① 《唐会要》卷二六《乡饮酒》,第498页。

② 《唐摭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一《统序科第》载“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第1页)

③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④ 《全唐文》卷五九六《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中即云:德宗贞元癸酉岁(九年),邑有秀士八人,“秋七月,与八人者乡饮之礼既修”(第6026页)。

⑤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言:“唐初的乡饮酒礼还在‘尚齿’与‘尚贤’之间徘徊,形势不同,侧重点也不一样。太宗、睿宗时期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重在‘尚齿’;高宗、武则天天时期大兴科举,士子受到更大关注,因而重在‘尚贤’,乡饮酒礼与贡举制度的结合应是在这个时期。”

⑥ 《唐会要》卷二三《武成王庙》,第435页。

主旨、忽而以“宾贡”钱行为目的的混扰也就很容易解答，不成为问题了。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云：“窃见乡饮酒礼颁于天下，比来惟有贡举之日，略用其仪。闾里之间，未通其事。”<sup>①</sup>若无前文已分析的结果即乡饮酒礼有两个仪式，显然我们很容易根据这段话得出结论：唐代乡饮酒礼未能得到推行。其实，此奏议却让我们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宾贡钱行的乡饮酒礼，因为贡举制度的实施而成为常典；父老百姓劝遵行礼、言及孝子养亲的乡饮酒礼仪式，虽然屡有朝廷诏令（贞观六年、唐隆元年、开元六年）却施行不佳。

及开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唐玄宗诏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sup>②</sup>。姜太公庙春秋祭祀，除用武舞之外，其余礼数亦如文宣王。至此，唐代文祭文宣王、武祭姜太公的文、武两个祭祀体系正式确立。而诸州宾贡武举人亦如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的规定，则表明唐代文、武取士皆用乡饮酒以“宾贡”钱行，由此与贡举配套的“宾贡”乡饮酒仪式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结合裴耀卿的奏议，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在地方官的实践中，还是在唐朝的制度体系中，这一时期乡饮酒礼的“宾贡”意义显然更为凸现。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唐朝廷编修官方礼典《大唐开元礼》之际。开元十四年，唐玄宗颁诏详议制定朝廷礼典，右丞相张说上疏否定“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的朝臣奏议，奏请曰：“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sup>③</sup>唐玄宗颁制从其奏议，“折衷”唐太宗时期修订的《贞观礼》和唐高宗时期修订的《显庆礼》，以编撰开元礼典。至开元二十年九月，新礼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颁所司行用。正是在此礼典之中，“沿为故事”<sup>④</sup>，以“宾贡”之礼定名为乡饮酒，而将“尚齿尊老”之仪式定名为“正齿位”，将此前同称为乡饮酒礼的二者正式区别开来。

乡饮酒礼被正式纳入《大唐开元礼》之中，完成了它礼制化的过程。而宾贡之仪，在开元礼典之中得以独专乡饮酒之名，正与唐代朝廷对贡举制度的重视直接相关。科举制度成为定制之前，朝廷征举士人，地方“以礼发遣”是古乡饮酒礼的遗意，唐代科举地位固定下来，也附着着将“宾贡”举贤能仪式的地位提升起来，进而独占了乡饮酒礼之名。可以说，乡饮酒礼与科举“宾贡”的结合，正是《大唐开元礼》完全予以明确的。《大唐开元礼·嘉礼》“乡饮酒”，开篇即云：

乡饮酒之礼，刺史为主人。此谓贡人之中有明经、进士出身，兼德行孝弟灼然显著、旌表门闾及有秀才者，皆刺史为主人。若无此色，皆判司摄行事。先召乡之致仕有德者谋

① 《全唐文》卷二九七《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第3011页。

② 《唐会要》卷二三《武成王庙》，第435页。

③ 《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8页。

④ 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之。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与之行礼，而宾举之。介以下无其人则阙。<sup>①</sup>

其“正齿位”篇则云：

每年季冬之月，县令为主人。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sup>②</sup>

“正齿位”仪中更规定，“宾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宾、主燕饮，毕，司正扬言：“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勸，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愆情，以忝所生。”<sup>③</sup>

有学者提到《开元礼》之乡饮酒与正齿位仪式基本相同，只是实施的场合不同。《新唐书·礼乐志》录自《开元礼》，其中亦云：正齿位仪式“其大抵皆如乡饮酒礼”。笔者比较了《大唐开元礼》之“乡饮酒”与“正齿位”仪，二者皆有迎宾、宴宾之礼，且歌曲相同，又皆有送宾之礼。其宴宾的仪式主要有：主人献宾（主人先取爵献宾，宾取爵还敬主人，主人酬宾）、主人献介（主人取爵献介、介还敬主人）、主人献众宾（主人向众宾献酒，众宾之长三人代表拜受饮酒，正齿位礼为三宾，其余众宾随之饮酒），作乐（先升歌：乐工四人于堂上歌《鹿鸣》，后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再次间歌：堂上升歌《南有嘉鱼》与笙奏《崇丘》相间而作，最后合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旅酬（主人为安宾继续饮酒，命相做司正，行旅酬之礼。由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众宾按长幼之序相递酬），无算爵（宾主坐，举爵饮酒，不计数，醉而后止），无算乐（乐工奏唱，不计其数，尽欢而止）<sup>④</sup>。这些仪式主要从《仪礼·乡饮酒礼》沿袭而来，显示着乡饮酒礼的古意。但二者亦有明显区别，大致有四点。一主人：乡饮以诸州刺史为主人或判司摄行事，正齿则诸县令为主人。二时间：诸州乡饮酒礼在贡举之时，诸县正齿位则季冬十二月。三宾介：乡饮酒礼以贡人中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介以下无其人则阙；正齿位礼则以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四仪式：乡饮酒有戒宾，正齿位无戒宾；乡饮酒无司正祝辞，正齿位有司正祝辞；乡饮酒礼有进羞，正齿位无进羞。这些区别反映出两种仪式的特点，表明二者已经成为各自具有独立职能的两种礼仪。“乡饮酒”明确定位为诸州贡

①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嘉礼·乡饮酒》，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03页。《新唐书·礼乐志》中乡饮酒之礼部分乃抄自《大唐开元礼》。

②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八《嘉礼·正齿位》，第606页。

③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八《嘉礼·正齿位》，第608页。

④ 《通典》（王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卷一三〇《开元礼纂类·嘉礼·乡饮酒正齿位附》中注文云“正齿位又无算乐”，乃指“乡饮酒”不设“无算乐”（第3346页）。然据《大唐开元礼》所载，乡饮酒礼中设有此仪，则杜佑之说有误。



举之时官长宾礼贡人“进贤能”的礼仪，而“正齿位”则是由县令宴饮众老的“序尊卑长幼”的仪式。由此，宾贡乡饮酒与正齿乡饮酒不再含糊于“同名异实”的状态，在官方礼典中得到明确区分。正式确认了正齿位礼的独立，以及乡饮酒礼与科举“宾贡”仪式的结合。

贡举是以州为发遣单位，所以宾贡乡饮酒礼要在诸州举行。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唐玄宗又诏敕“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其所贡之人，将申送一日，行乡饮酒礼。牲用少牢，以现物充”<sup>①</sup>。具体规定了“牲用少牢”。《唐六典》卷三〇“上州中州下州官吏”功曹、司功参军条云“（诸州）凡贡人行乡饮酒之礼，牲用少牢”。《大唐开元礼》颁行后，二十五年诏令及《唐六典》的规定，再从制度文本的角度给予“宾贡”乡饮酒礼确认和固定。值得注意的是，《大唐开元礼》不仅反映出“宾贡”仪式独专乡饮酒之名，也表现出正齿位礼的“县级化”。清人秦蕙田著《五礼通考》卷一六七《乡饮酒礼》中曰：“乡饮酒之礼见于经传者有四……汉制郡国行乡饮酒礼，盖用正齿位之说，魏晋以下间或行之，唐兼采二说。宾兴贤能则以刺史或上佐为主，其制皆仿于古而小损之……正齿位则行于冬季，主人以县令为之，复降杀其礼。”唐代“兼采”古乡饮酒礼之宾贤能和正齿位两种礼义，将宾贡进贤之仪式归于州，由刺史或上佐为主；将尊老正齿之仪式归于县，由县令为主，这些都在《大唐开元礼》中得到明确规定。我们注意到，隋代定制，地方州、郡、县学校皆行乡饮酒，以尊老正齿；唐贞观、开元六年的诏令之中，也是强调州、县牧宰皆行乡饮礼仪、齿别长幼以行教化；而唐代以后，南宋时期尊老尚齿的乡饮酒礼仪式亦明确规定州、县两级举行。由此而言，显然只有开元礼典中强调正齿位之礼行于县里，追溯其因，或许源于周代“党正蜡祭饮酒”之古义。但似乎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这是礼典修撰过程中厘清和明晰此前乡饮酒礼“同名异实”混乱状态的一种手法，将乡饮酒礼的两种路线确定为州、县两级。因为州里举行宾贡乡饮酒礼，而县里不必举行其仪，于是就在县里举行正齿位之礼。但诸州“宾贡”之外不再有“尚齿”之礼，从礼仪教化、敦睦风俗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缺漏。

《大唐开元礼》从礼典的角度明确了“乡饮酒”与“正齿位”的分离，但在礼典之外仍有混扰之处。开元二十七年修撰完成进上的《唐六典》中规定，凡诸州贡人，“行乡饮酒之礼，牲用少牢”<sup>②</sup>；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又有：“每岁季冬之月，行乡饮酒之礼，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于堂下，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节。”<sup>③</sup>而显然抄录自《唐六典》的《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亦云：县令掌导风化，“每岁季冬，

① 《唐会要》卷二六《乡饮酒》，第499页。

② 《唐六典》卷三〇《上州·中州·下州官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8页。

③ 《唐六典》卷三〇《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官吏》，第753页。

行乡饮酒礼”。《唐六典》将县令主持的“正齿位”礼与诸州举人仪式依旧皆称为“乡饮酒礼”。可见，开元礼典中虽然将诸州宾贡的“乡饮酒”与诸县尊德尚齿的“正齿位”区分开来，解决了唐代前期乡饮酒礼“同名异实”的问题，但这只是礼典修撰层面的区分、定位，礼典之外仍然含糊，并没有将之明确区分开来。杜佑修撰《通典·开元礼纂类》中有“乡饮酒礼正齿位附”条，指明两礼仪式差异之处，如主人、宾介选择、戒宾有无以及司正宣言等处，皆有文字说明。“以类相从、礼异加注”<sup>①</sup>，是杜佑编《开元礼纂类》的修撰方式。也就是说，在杜佑看来，虽然“正齿位”与“乡饮酒礼”在《开元礼》中分开，其实二者还是一类礼仪。又如《新唐书·礼乐志》也认为“正齿位”仪式“大抵如乡饮酒礼”。而这种含糊状态在地方官的施政实践中也有所表现。例如，李栖筠为常州刺史时，“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sup>②</sup>。此处乡饮酒礼，因其方“大起学校”，应该不是贡举之际举行的宾贡饯行仪式，而是刺史举行的以尊德尚齿、序长幼尊卑为主旨的正齿位礼仪。或者是没有宴请父老高年以饮酒正齿，只是以学生为主的劝导孝友的宴饮仪式。显然，《大唐开元礼》对唐初以来的乡饮酒礼的两种路线给以确定，凸现了“宾贡”乡饮酒礼仪的地位。但是，其制定颁行之后，非宾贡职能的宴饮仪式仍然保持着乡饮酒礼的称谓，并未因为这种将乡饮酒礼之名定于宾贡仪式的做法而受到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不能忽视的是汉代以来的乡饮酒礼以尊老尚齿为主旨的概念倾向的影响。

如前所述，因为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宾贡乡饮酒礼在诸州贡举之际得到了遵行。但是，也正是因为与科举的结合，宾贡乡饮酒礼失去了其独立性，演变成为诸州举人的配套仪式。诸州无举人，则宾贡之仪不行。例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既云：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sup>③</sup>。若国家政局动荡，科举制度遭遇毁坏，则宾贡之仪也随之废坏。如僖宗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赆，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sup>④</sup>僖宗广明之后，州县不乡贡，宾贡乡饮酒礼也随之不行，钟传荐士乡饮之举，已属特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后期，宾贡乡饮酒礼还出现了“贡士有宴”的新变化。据欧阳詹《泉州刺史席公<sup>⑤</sup>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文云，“贡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礼也”。即载德宗贞元九年，邑有秀士八人，将首荐于阙下，秋七月，刺史席相

① 《通典·点校前言》，第4页。

②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6页。

③ 《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九，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④ 《新唐书》卷一九〇《钟传传》，第5487页。

⑤ 泉州刺史席公指席相，参看郁贤皓《唐刺史考》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91—2192页。

“与八人者乡饮之礼既修，乃加之以宴”<sup>①</sup>。按文中所云，唐代诸州举人惟遣之日行乡饮酒礼，乃“享礼也”，“享以昭恭俭”，因有节制。席相认为此种“截肉元酒，莫饮莫食”局面有碍于激励邦俗，“念肉不使食，则仁不下浹；酒不使饮，则欢不上交”。既然吃肉喝酒不能尽情，则教化之意、欢庆之情也不能很好地体现。于是席相在修乡饮酒礼之后，更设宴“以示慈惠”，乃在后一日选择东湖亭举行宴饮。也就是说，泉州在贞元九年解送举人之际，刺史席相先是于学校修乡饮之礼，并于后一日在东湖亭举行了另一场宴会。而欧阳詹所谓“新礼”，正是指“东湖亭之宴”，而非指乡饮酒礼。<sup>②</sup>其宴仪式：宾主“揖让升堂，雍容就筵。乐遍作而情性不流，爵无算而仪形有肃”。与乡饮酒礼相比，此宴饮亦设宾主、有揖让之节，但是氛围略显宽松，更有诗句雅章赞颂唱和。对此新礼，欧阳詹之评语有着意推崇、夸赞之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宴于州学之外，行于东湖亭这一更趋开放的场所，“于是老幼来窥”，扩大了宴饮仪式教化的影响面却当为事实。显然，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之后，沿袭于古乡饮酒礼“宾贤能”之意的诸州贡举“宾贡”乡饮仪式，因其“恭俭”拘谨之缘故，渐趋不能适应渲染地方文教兴盛的需要、不能尽祝贺与欢庆之意，于是出现了可以更趋于开放的表达欢庆和谐气氛的州学之外场合内的宴会。而席相先乡饮后有宴的做法，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唐代后期针对《大唐开元礼》所规定的“宾贡”乡饮酒礼的改易已经开始了。

## 二 鹿鸣宴的剥离与“尊德尚齿”概念的回归： 北宋乡饮酒礼的发展

唐末乱世，政局动荡，朝廷仪制亦往往废坏。后唐长兴三年曾颁《复乡饮酒礼敕》<sup>③</sup>，令诸州解送举人之时，举行乡饮酒礼；及清泰二年九月中书门下曾下令太常草具仪注<sup>④</sup>，颁下诸州，预前肄习，解送举人之时，便行其礼，然“竟不能行”。后唐所定乡饮酒礼，明显就是沿袭唐开元之制解送举人的宾贡仪式。宋初所修《开宝通礼》，“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据此推测，乡饮酒礼有可能也是沿袭唐开元之制，以诸州解送举人之时举行“宾贡”乡饮酒礼。但因《开宝通礼》今不得见，这

① 《全唐文》卷五九六《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第6026页。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乡贡”指出，欧阳詹是贞元八年进士及第的，这篇文章当是他在进士及第后回福州，第二年参与泉州刺史饯送举人时所作（第51页）。

② 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新礼”之称，在于此前泉州州学之乡饮酒礼恐废而不行，因此席相在贞元九年七月为贡士八人举行的乡饮酒礼被称为“新礼”。

③ 《全唐文》卷一一一，第1137页。

④ 《五代会要》卷四《乡饮》，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2页。又据《旧五代史》卷四六《末帝本纪上》载：清泰元年九月，中书门下举行长兴三年敕，常年荐送举人，州郡行乡饮酒之时，帖太常草定仪注奏闻。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39页。

只能是推测而已。事实上,并无宋初讨论此礼仪的记载。

直至宋太宗淳化三年,才有关于乡饮酒礼的讨论。据《玉海》记载:淳化三年正月七日,诏有司讲求乡饮酒故事,“命学士承旨苏易简等撰乐章三十四,鹿鸣六、南陔二、嘉鱼八、崇丘二、关雎十、鹊巢六。”<sup>①</sup>五月五日,礼院详定其仪。后不果行”<sup>②</sup>。淳化三年乡饮酒礼的讨论,不仅修撰乐章,太常礼院亦详定乡饮酒之礼仪。但因记载阙略,无法得知具体礼仪规定。此番讨论乡饮酒礼是宾贡仪式还是正齿礼仪呢?据清人秦蕙田之论:“淳化修乡饮之仪,实自(田)锡言之。”<sup>③</sup>按宋太宗时乡贡进士田锡奏请复乡饮酒礼,其奏疏中主要阐释乡饮之尊德尚齿、孝悌和睦之功效。<sup>④</sup>由此推知,由田锡引发的淳化乡饮酒礼的修订,乃是尊德尚齿的礼仪。显然并未受到《开元礼》将乡饮酒之名挪于宾贡仪式之上的做法的影响,淳化乡饮酒礼的讨论仍然明确将尊德尚齿之仪式定名为乡饮酒礼。此后,对乡饮酒礼的讨论不断。北宋真宗初,孙何“献五议”,其中一议为“请行乡饮酒礼”<sup>⑤</sup>。又宋仁宗时,王琪起进士,调江都主簿,“上时务十二事”,其中亦有请行乡饮事。<sup>⑥</sup>此外,地方官举行乡饮酒礼事例不断出现,例如宋仁宗时王沿“知滑州,徙成德军。建学校,行乡饮酒礼”<sup>⑦</sup>。宋哲宗时杨存为循州长乐县令,地处偏僻,士不知学,杨存延士子修学校,与诸生行乡饮酒礼,民风一变。<sup>⑧</sup>民不知学,方得修学校,此乡饮酒礼显然不是贡人之礼,乃是尊德尚齿的正齿之礼。北宋元祐中,天台令郑至道“谕俗七篇”,其中“恤邻里”篇云:“乡饮酒之礼于岁十二月率乡党之民,会聚饮酒以正齿位。长者坐,少者立,老者食以厚,少者食以薄,所以示民以孝悌之道也。”<sup>⑨</sup>此处所言,大致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段内乡饮酒礼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正是沿袭“正齿位”礼的尊德尚齿、孝悌于家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尊德尚齿之仪被称为乡饮酒礼时,北宋诸州“宾贡”饯行的专门仪式却非称乡饮酒礼,而是呼之为鹿鸣宴。<sup>⑩</sup>北宋州郡贡士,有饯行宴饮仪式鹿鸣宴,鹿鸣宴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唐宾贡乡饮酒礼所没有的,那就是鹿鸣宴中有赋诗唱和

① 《宋史》卷一三九《乐志十四》载“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然其后列: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其总数实为三十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295页。

② 《玉海》卷七三《礼仪》,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365页。

③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六八《乡饮酒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田锡:《咸平集》卷二《请复乡饮礼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史》卷三〇六《孙何传》,第10097页。

⑥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附从兄琪传》,第10245页。

⑦ 《宋史》卷三〇〇《王沿传》,第9959页。

⑧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二《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宋]陈耆卿撰《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认为,“唐及北宋人多称此礼为鹿鸣宴”。此观点还需考辨,事实上是北宋开始称之鹿鸣宴,而唐人并无此称呼。

之举。北宋人文集中留下众多关于鹿鸣宴的诗文，其诗文内容以赞誉贡人、夸耀当地儒风文采、预祝举人进士及第，或夸赞地方官推行儒学教化等为主。例如赵抃有《杭州鹿鸣宴示诸秀才》、《次前人越州鹿鸣宴》二诗。按《宋史》本传，赵抃于神宗时先后知杭州、越州，则此两首鹿鸣宴诗当为其任职期间举行鹿鸣宴时所作。至于鹿鸣宴上赋诗，南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四云：“故事，鹿鸣宴赋诗，所以致劝驾之意。如蒙继和，不必次韵，或五言，或七言，或一首，或二首，各从其便，庶几得以观志也。”

除了赋诗唱和之外，北宋鹿鸣宴举行的地点也与唐代宾贡乡饮酒仪式不同。唐代宾贡乡饮酒礼固定行于州学，而宋鹿鸣宴则行于学校之外。如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叙》中云：“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sup>①</sup>按中和堂，《咸淳临安志》卷五二云：钱武肃王阅礼堂旧址，宋仁宗至和三年，郡守孙沔建堂其上，更名中和。可知，杭州宾贡宴会并非行于学校。另外，苏轼知徐州有《鹿鸣宴》诗，按《苏轼文集》卷一〇《徐州鹿鸣燕（宴）赋诗叙》云：“元丰元年，三郡之士皆举于徐。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修旧事也。”三郡之士举于徐，苏轼修“旧事”饯行，宴饮地点为黄楼。按苏辙《黄楼赋并叙》所载：熙宁十年，河决澶渊，水及彭城下，苏轼为彭城守，率众登城捍水。水既去，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垾以黄土，曰“土实胜水”，故以为名。<sup>②</sup>又按《宋史·王素传》载王素之子王巩有隼才，长于诗，访苏轼于徐州，苏轼“待之于黄楼上”。可见，黄楼修成之后成为当地一个胜地，也是文人宴会之所。元丰元年徐州鹿鸣宴的地点正是黄楼，而非学校。从赋诗唱和、宴饮地点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宋代鹿鸣宴与唐代诸州宾贡乡饮酒的差别。然根据诸诗文考究鹿鸣宴仪式大致为：知州为主人，率属僚与贡举之人为主宾，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从仪式内容中，又可看到二者之间的沿袭，显然鹿鸣宴正是源自唐宾贡乡饮酒礼。如前文所述，唐后期已经出现了“贡士有宴”、诗词唱和的事例，在乡饮酒礼之外，另外举行宴会之仪式，显然北宋鹿鸣宴正是唐代后期“贡士有宴”的进一步发展。

又按清人秦蕙田云，唐制，贡举之时“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讲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而“鹿鸣宴之名始于此”<sup>③</sup>。则鹿鸣宴之名是始于唐宾贡仪式中的“歌《鹿鸣》之诗”。按照古礼乡饮酒仪式，《鹿鸣》是最早奏唱的，其后亦有其他诗歌。《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鹿鸣》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描述君与嘉宾欢宴的场景，亦有显示和谐秩序、取得贤才之意。至汉以后，“对《鹿鸣》‘鹿鸣’的阐释，明显的由主客意

① 《苏轼文集》卷一〇《送杭州进士诗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325页。

② 《栾城集》卷一七《黄楼赋叙》，《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5页。

③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六八《乡饮酒礼》。

识转为君臣上下关系，同时也藉此表达乐贤之意”<sup>①</sup>。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宾贡乡饮酒礼成为配合科举的固定仪式，首唱的《鹿鸣》之歌也就更加凸现其取贤才之意。《通典》卷一五《选举典》“历代制”云：自京师郡县皆有学，每岁<sup>②</sup>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又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明显可以看出“歌《鹿鸣》之诗”的突出意念，或者说，“歌《鹿鸣》之诗”已经成为行宾贡乡饮酒礼的鲜明的标识。另见唐宪宗时潮州刺史韩愈著《潮州请置乡校牒》，既云：“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sup>③</sup>韩愈感叹潮州州学久废，百多年来无有进士、明经贡于王庭者，因此宾贡乡饮酒礼也就不举行。在此文中，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目识、耳闻相对应，更将“乡饮酒之礼”与“《鹿鸣》之歌”直接对应，显然“《鹿鸣》之歌”的标识性进一步凸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成为“宾贡”饯行仪式的代名词。如果说《鹿鸣》之歌的标识性的不断提升，与唐代乡饮酒“宾贡”职能的不断凸现以及其日趋失去独立性转化成为贡举的配套仪式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贡士有宴”的出现，则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对饯行宴饮仪式表现祝贺、欢庆气氛的需求不断强烈的结果。唐席相为贡士举宴，是先修乡饮之礼于学，后一日再有宴。然考北宋人诗文所载，未曾言及学校之中尚有仪式，只是行鹿鸣宴于学校之外某处。显然，至北宋时期，诸州解送举人之日，行于学校的乡饮之仪已经被废弃，遵行于诸州的是行于学校之外、宾主揖让、饮酒欢庆、赋诗唱和的“鹿鸣”宴会。

直到五代时期，“宾贡”宴仪，仍称之为乡饮酒礼，这一点从上文对五代乡饮酒礼的讨论可以看出。正式开始使用“鹿鸣宴（燕）”指代“宾贡”宴饮仪式的是北宋时期，这在北宋文人著述之中可以明显看出。而在官方制敕诏令中出现，是在政和议礼局讨论礼仪修订之际。政和二年，议礼局检讨五礼仪注，进呈札子曰：

先儒议乡饮酒礼有四……后世腊蜡百神、春秋习射、序宾饮酒之仪不行于乡国。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sup>④</sup>

由此推断，北宋时期已经形成稳定的以“鹿鸣宴”饯送举人的惯例。行于学校之外，尽欢庆之情、赋诗唱和的鹿鸣宴会，显然已经与古乡饮酒礼甚至《开元礼》中的诸州乡饮酒礼有了很大的距离。据政和议礼局札子中云：

① 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② 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通典》此处所载“每岁仲冬”，当系错简。

③ 《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九，第506页。

④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则与今之礼不同。其器以笱豆尊俎，则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则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则与今之仪不同。<sup>①</sup>

以此段文字为主，参考《仪礼》、《礼记》、《开元礼》乡饮酒礼的规定，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宾主僎介的设置，还是笱豆尊俎礼器，或者是宾主之位，甚至宾主之间的献酢酬诸节，北宋鹿鸣宴与古乡饮酒礼及多沿袭古礼的《开元礼》都截然不同了。第一，古礼有宾、主、僎、介（及众宾）；唐礼有宾、主、介（及众宾），无僎；北宋鹿鸣宴则宾、主、僎、介的设置与古不同，按此奏议下文之意，鹿鸣宴设立主、主党、众宾。第二，古礼以笱豆尊俎为器，唐礼之中还用笱豆尊俎，至宋礼器已有变化。第三，《礼记·乡饮酒义》宾于西北，介于西南，主人在东南，唐礼与古礼相同；文中所言“与今之位不同”，可以理解，若并不设宾主介僎，也就谈不上位置是否相同了。第四，《仪礼·乡饮酒礼》所谓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唐礼有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主人献介，介酢主人，主人献众宾，与古相同；文中所言“与今之仪不同”，则可推断，如果鹿鸣宴已经不设宾主介僎，则献酢之节也一定与古礼或开元礼不同了。以上四点是根据议礼局的奏议得出的推论。显然，唐礼多沿袭古礼，而宋鹿鸣宴与唐礼已不同，与古礼相差甚远。其仪制大致为：诸州军贡士之日，以知州、军事为主人，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宾主位次、礼器、献酬诸仪皆从今宜。政和论礼，直接提及鹿鸣宴行“乡饮之遗礼也”，承认鹿鸣宴对乡饮酒的沿袭之外，明确了贡士宴饮不再称为乡饮酒礼，鹿鸣宴已非乡饮酒礼的事实。“宾贡”仪式由乡饮酒到鹿鸣宴，由称谓到内容的变化，反映的正是“宾贡”乡饮之仪逐渐脱离了乡饮酒礼的范畴，进一步演变成为科举体制下的具有专门称谓、专门内容的宴饮仪式。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北宋初以来“乡饮酒礼”之称谓所蕴涵的概念已经渐趋缩小和固定为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父老宴饮的仪式。

如前文所述，北宋初以来，无论是朝廷还是州县地方官，对乡饮酒礼尊德尚齿、教化乡里之功效，皆有一定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促使政和制礼之际，开始了修订乡饮酒礼的讨论。如政和议礼局札子云：

今欲因今之宜，参酌循立，每岁，惟于州军贡士之日，以礼饮酒。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谋宾养老之意也。当贡生与州老序位以齿，亦古者正齿位之意也。是日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其余降

<sup>①</sup>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

登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类，并参照辟雍宴贡士仪，庶几可行于今而不失稽古之意。兼契勘以鹿鸣燕，亦恐未当。伏望断自圣学，以幸天下，取进止。”

贴黄：“如允所请，乞应州郡鹿鸣宴并改作乡饮酒礼，仍乞先次施行。”<sup>①</sup>议礼局所言“因今之宜，参酌循立”的仪式，其一，以知州、军事为主人之外，增加了“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的规定，这是与北宋崇宁二年始设提举学事司机构相关。<sup>②</sup>其二，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也就是说，其仪式只设立主人、主党与众宾。其三，强调“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谋宾、养老之意；又贡生与州老“序位以齿”，亦有正齿位之意；又是日“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习射于序之意。显然正力图将古乡饮酒礼仪中的宾贤、养老、正齿、乡射诸形式加入其中，呈现出明确的复古倾向。其四，降登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类，并参照辟雍宴贡士仪。辟雍宴贡士仪，按《政和五礼新仪》卷二〇三“辟雍赐闻喜宴仪”：押宴官以下与释褐贡士东西相对，其乐：押宴官以下及释褐贡士班首初入门，奏正安之乐，酒初行奏宾兴贤能之乐，酒再行奏于乐辟雍之乐，酒三行奏乐育人材之乐，酒四行奏乐且有仪之乐，酒五行奏正安之乐。<sup>③</sup>其仪有：望阙再拜，中使宣敕，酒五行，赐花有差，望阙再拜，再座，酒四行（乐亦四节次）讫，次日入谢。又据《宋史·乐志十四》载“政和鹿鸣宴五首”，首酌，正安之乐；再酌，乐育人材之乐；三酌，贤贤好德之乐；四酌，烝我髦士之乐；五酌，利用宾王之乐。<sup>④</sup>乐章与唐乡饮酒乐章不同，是新作乐章，明确体现举贤才之意。议礼局所修仪制，无主献宾、宾酢主、主献介之诸仪，只有酒五举，乐五节。可见，政和以前的北宋贡举鹿鸣宴已经是宾主举酒、奏乐而已，并非如古礼或唐礼有着繁复的宾主献酬仪节。《宋史·礼志》亦云：“政和礼局定饮酒祭降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属，并参用辟雍宴贡士仪。”因此，政和议礼局修订的“庶几可行于今而不失稽古之意”的乡饮仪式，就是遵循宾主对坐、酒五行的今宜，再加入养老、正齿、乃至习射的复古因素，稽古之意，将鹿鸣宴改头换面成为“复古”乡饮酒之礼。<sup>⑤</sup>政和三年正月一日，宋徽宗御笔：“稽古者不必循其迹，州郡鹿鸣宴乃古乡饮之意，可止改鹿鸣之名。有

①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

② 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载：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第3971页）。

③ 按《宋史》卷一三九《乐志十四》大体相同，只酒三行时奏“乐育英才”之乐。载“大观闻喜宴六首”，与《政和五礼新仪》名目相同。

④ 按《玉海》卷一〇六记载，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颁嘉（鹿）鸣宴乐章五曲，注文所列却只乐育人材、贤贤好德、烝我髦士、利用宾王四曲，与《宋史·乐志》所载尚缺第一曲正安之乐。

⑤ 《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云：“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此处记载缺漏“议礼局奏议”字样，略有含糊，使人误以为当时之制已然如此。（第2721页）



古乐处令用古乐。”<sup>①</sup>鹿鸣宴改名为乡饮酒礼，并强调古乐的使用。此后礼仪讨论中，宋人对乡饮酒礼的复古并未中止，政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定贡士射仪。<sup>②</sup>因乡饮而习射于学。

总的看来，政和议礼局试图复古乡饮酒礼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贡举鹿鸣宴的基础上掺杂一些“养老、乡射”古意而已，其本质还是鹿鸣宴。此番改头换面显得有些生涩、僵硬，恰恰表明了鹿鸣宴已经剥离于乡饮酒礼的概念，与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科举配套仪式的事实。也正是由此，自大观初建立议礼局讨论礼制本末，修成大观礼书，到政和三年颁行《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中既无乡饮酒礼，亦无鹿鸣宴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生涩、僵硬的复古，既无法适应推行孝悌、仁义之教化于乡闾之间的目的，在“鹿鸣”之意凸现的情况之下，也无法真正达到对鹿鸣宴的改易。但是，这种对鹿鸣宴的改易企图，却也正表明了政和时期朝廷全面考虑国家礼制体系之际，开始重新审视乡饮酒礼尊德尚齿之意以及其教化乡里、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功能。

### 三 “尊德尚齿”之仪与地方儒林盛事：南宋乡饮酒礼的状态

南宋时期乡饮酒礼修订过程中，对鹿鸣宴自乡饮酒礼概念中“剥离”的事实已有清晰认识。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四月，颁乡饮酒礼于郡国：

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乡饮酒矩范仪制，请遍下郡国’。今取明州已行仪制与林保所具规式参酌修具，镂版颁行”。奏可。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觶、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sup>③</sup>

据此，礼部将林保所修乡饮酒规式与明州遵行的仪制参酌修具成为乡饮酒礼仪注，颁行天下。按《宋史·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云：“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

①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

② 《玉海》卷七三《礼仪》，第1365页。其具体仪式见《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然《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载“礼官参定射仪：乡饮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本州兵马教谕备弓矢应用物，设乐。其日初筵，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执弓矢，揖人射……”（第2721页）文中两处“应赴乡饮酒官贡士”标点有误。据政和二礼仪礼局札子，乡饮酒礼参加者为提举学事司、知州军事、当贡者、州之群老以及本州属官（《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其中，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比较而言，贡士射仪，州之群老不参加其仪，参加者为提举学事、知州、通判、州学教授，还应有当贡者及本州属官。则上文两处“应赴乡饮酒官贡士”中间应当有“顿号”，即为“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其仪注当为：乡饮酒前一日，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行礼之日，“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

③ 《玉海》卷七三《礼仪》，第1366页。

存，淳化中会例行之。”明州保留乡饮酒礼，其仪制乃沿唐贞观仪制。前文所言，贞观乡饮酒礼大概沿袭古礼而成，具体内容今已不得见。及《开元礼》修成，折中贞观、显庆二礼，其中乡饮仪，亦主要是沿袭《仪礼》。绍兴十三年颁行乡饮仪制中有主、宾、僎、介、三宾设置以及主、宾、介与众宾的献酬仪节，显然这种乡饮酒礼仪式与北宋政和议礼局奏请由鹿鸣宴改名的乡饮酒礼不是一回事，而是遵循古礼、唐礼与明州仪制加以时宜参酌制定。

根据《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一至三所记载的，礼部取明州仪制与林保所修者参酌修订并颁行的乡饮酒礼具体仪式，与《仪礼·乡饮酒礼》、《开元礼·正齿位》比较，绍兴乡饮酒礼的仪式明显简略。与两者相比，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的具体特点在于：第一，明确行之于州及县。第二，设立了主（州以郡守、县以县令为主）、宾（择乡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为宾）、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其主、宾、僎、介的位置与古礼相同。开元礼无“僎”，绍兴仪制则有“僎”，显然绍兴乡饮酒礼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第三，“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制不见明确规定于古礼与唐《开元礼》。第四，仪制中“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诸节，比唐《开元礼》简略。唐《开元礼》中，宾主献酢之际，皆有祭酒，而这里主人在献宾之前，单独有一个祭酒的仪式，此后献酬之际再无祭酒之仪。主人献宾，唐礼由主人取爵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三者组成，这里只有类似主献、宾酬两项内容。唐礼中有主人献介、介酢主人之仪，这里只有主人酬介之仪。唐礼中有主人献众宾之长、献众宾之仪，这里只有介酬众宾之长、众宾之仪。唐礼有作乐歌笙，此礼无有。作乐之后，唐礼有旅酬之礼，司正扬觶，然后是无算爵，无算乐。这里却只有修爵无算，酒三行。特殊的是，主人沃洗一节为唐礼所无；唐礼只有门外两拜，这里有拜既、拜送皆两拜。第五，“司正扬觶致辞”的寓意，充分显示了绍兴乡饮酒礼明显的尊德尚齿、劝导忠孝节义、和睦乡里的主旨。综合来说，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形式。<sup>①</sup>

又据《宋史·礼志十七》记载：绍兴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乡饮仪制，遍下郡国，于是国子祭酒高阅草具其仪上之，“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閤，诸儒莫解其指意”。按此评语，其僎介之位与古制不合，诸儒不解其意，当是不得众人认可。但是，根据上文所论，绍兴十三年乡饮酒仪制中宾、主、僎、介之位皆遵《礼记》，

<sup>①</sup> 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认为，绍兴乡饮酒礼《仪制》规定行礼时的主人为“州以郡守，县以县令”，“这便将北宋鹿鸣宴主要由州郡发解举子时举行，下延到县一级”。此处作者未能清晰了解“鹿鸣宴”与“乡饮酒礼”的分离态势，仍将绍兴乡饮酒礼规定认定为“宾贡”的宴饮仪式“鹿鸣宴”。

与《开元礼》亦大体相同。另见王应麟《玉海》卷七三《礼议》载，绍兴十三年礼部奏请颁行乡饮酒礼仪制，其礼包括主、宾、僎、介、三宾……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并未提及“诸儒”评议。另外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甲集卷一三中“乡饮酒礼”条记载绍兴十三年乡饮酒仪制，亦未有类似评语记载。则《宋史·礼志十七》的评语当有失公允。若联系下文，对此评语的出现也就有些明了。按此卷下文载：“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由此推测，《宋史·礼志》中对绍兴十三年仪制的评语，有可能就是为了“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的说法做铺垫，以强调朱熹改定仪制。然看文中所载朱熹改定仪制条文，却发现其中存在明显失误之处。据《宋史·礼志十七》所载，朱熹庆元中改定的乡饮酒礼内容，与《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一至三所载的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奏请的仪制基本相同。然据《朱子语类》所载，朱熹认为绍兴乡饮酒礼“仪制极乖陋”，在于礼官高闾（抑崇）撰礼“疏缪”，“更不识着《仪礼》，只把《礼记·乡饮酒义》铺排教人行。”朱熹指责绍兴乡饮酒礼之误，所指明错误之处是拜送、拜既以及执爵祭脯醢这样的具体仪节。朱熹认为：

《仪礼》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拜至，谓至阶；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拜既”，岂非大可笑！礼，既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荐脯醢”，自教一人在旁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sup>①</sup>

朱熹认为绍兴乡饮酒礼中的拜送、拜既两节，将“堂上礼”误作“送之门外”后的拜礼仪节。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中拜送、拜既二节分别是：拜送，主人兴，复至阼阶檐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檐下立，三宾亦至西阶，并南乡，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拜既，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北上，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又按《仪礼·乡饮酒礼》，“宾出，奏《陔》。主人送于门外，再拜”。只是门外再拜的仪节。唐《开元礼》之“乡饮酒”、“正齿位”之送宾仪节亦规定：“宾主俱兴，宾以下降自西阶，主人降自东阶。宾以下出立于门外之西，东面北上。主人送于门外之东，西面再拜。宾、介逡巡而退。”<sup>②</sup>显然是遵循《仪礼》而来，行门外有再拜之礼。则朱熹准《仪礼》所改定之仪节，应当亦只是“庠门之外再拜”而已。然《宋史·礼志

① 《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乡饮酒》，《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89页。

②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乡饮酒》、卷一二八《正齿位》。

十七》所载朱熹庆元中修订之文，其送宾仪节，虽无“拜送”、“拜既”之名，但送客再拜、出门外再拜之仪与绍兴乡饮酒礼仪之拜礼皆相同。<sup>①</sup>据此推测，《宋史》是误将绍兴礼文纳入朱熹名下，却不知朱熹正是以为其仪制之谬贻笑千古。

虽然绍兴乡饮酒礼仪制中有类似“拜送”、“拜既”这样的与《仪礼》不合的谬误，但是并不影响绍兴乡饮酒礼尊德尚齿、教化州县的定位，而此与唐乡饮正齿之意相差无几。然由颁行仪制后附加的“约束九事”，却明确反映出绍兴乡饮酒礼与唐礼的明显差异。据《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三至四所载“约束凡九事”的具体内容，前二事通过士行判定、建立乡饮年齿簿，构建一个涉及乡里、学校的地方文人网络、道德评价体系。第三事“轮请本土大夫老成者与州学教授同主其事，其所立宾及僎介，并与主人谋之”，乡饮酒礼的主导权显然是由地方官向本土大夫群体倾斜。第四事合赴乡饮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乡饮酒官具书，以礼敦请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请之”。另外，本学编排位次，“十九岁以下并侍立”，“曾得解者许坐”，以及“父在坐，则子侍立”，“有官者别席”，“七十岁以上许免拜”，诸项规定明确体现了养老尚齿之意。其中对有官者、曾得解者的优待，正是不以齿先于爵，亦不爵加于齿之意。第五事“乡饮所须饮食、器具，敦请乡之大夫有功力者，各备十位，力可倍者，倍之”。则表明乡饮酒礼要地方士大夫出钱出物进行资助。前文已经涉及，唐代诸州宾贡乡饮酒是公费，牲少牢以现物充；县令正齿位之仪亦“皆用酒脯，物出公廩”<sup>②</sup>。而此处的地方士大夫资助，更明确显示出地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和作用。第六事及第八事，规定不得擅自不赴，不得无故喧哗争讼等，强调乡饮酒礼的纪律性和强制性。第七事“不系学籍及齿于乡饮者，不得称进士”，将乡饮

① 《宋史·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载：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乡饮酒，其仪有“主人兴，复至阼阶檐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第2722页）文中两处“僎从”标点有误。按《礼记·乡饮酒义》云：“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可知，僎有辅助主人之意，孙希旦《礼记集解》“乡饮酒义”亦曰“僎乃赞成主人之礼者，故坐于东北以辅主人。”僎，辅助主人完成礼仪之人，于仪式之中乃跟从主人之后，并非跟从宾介之后，因此“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之说有误。又按《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三载绍兴十三年，礼部颁行乡饮酒礼，其送宾之仪中云：“相者引主人兴复至阼阶檐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檐下立三宾亦至西阶并南乡”。又云“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北上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赞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此两处“僎从”皆为小字注文，明确是僎从主人后之仪。由此而言，《宋史·礼志十七》文中第一处“僎从”标点应是“主人兴，复至阼阶檐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文中第二处为“僎从主人再拜”，虽是跟从主人后，却也有不妥。此句所述为送宾至庠门外，宾、主、僎、介各就其位站立，然后相拜。又按前引《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三所载“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赞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则此处当为主人立于门外之左，僎跟从立于主人之后。因此句中标点当为“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

② （日）仁井田陞原著，栗劲等编译《唐令拾遗》“仪制令”之“诸县乡饮酒礼”，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437页。

酒与诸路举人联系起来。而第九事“有该载不尽及难举事件，并各从其乡之便”，进一步表明尊德尚齿、劝导孝悌的乡饮酒礼的地方性色彩的加重。综上所述，绍兴乡饮酒礼仪制在于构建敦睦、少长有序的地方秩序，但从建立文人乡饮年齿簿到本土大夫老成者与州学教授同主其事，再到敦请乡大夫资助所需饮食器具，与唐代尊德尚齿之仪相比，绍兴乡饮酒礼增添了更多的地方文人群体的色彩。换句话说，这种乡饮酒礼更倾向于地方官与地方文人群体合作而行的仪式，是地方儒林盛事。

绍兴乡饮酒仪制“镂版颁行”于州县，并明确要求“不系学籍及齿于乡饮者，不得称进士”。绍兴十七年正月，左迪功郎陈介进言：“国家颁降乡饮酒仪式，而诸郡所行，疏数不同。望令三岁科举之年，行之于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饮酒于序之意也。”<sup>①</sup>最终，宋高宗颁令“郡县于科举之年，行乡饮酒礼于庠序一次。如愿每岁行之者，听从其便”<sup>②</sup>。至此，明确要求郡县乡饮酒礼在三岁科举之年举行。乡饮酒礼既行于科举之年，是否就成为“宾贡”的仪式呢？唐代诸州宾贡乡饮酒礼以及北宋鹿鸣宴，是以通过州试的当贡者为宾的宴饮仪式。对这些解试合格的当贡者，南宋仍有举行鹿鸣宴之制，而这一点在南宋文人的鹿鸣宴诗文中，有着明确的反映。显然宋徽宗时改鹿鸣宴为乡饮酒礼的诏令，并未为南宋沿袭。例如王之道《鹿鸣宴》诗下注文云：“乾道乙酉，无为太守吕公以冬十一月庚戌举送进士，循旧典，开鹿鸣之宴。”<sup>③</sup>而绍兴乡饮酒礼即使固定行于三岁科举之年，亦非诸州“宾贡”仪式。按绍兴十九年礼部奏请所行之制，州军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上于州，州学核实应举人引保后，赴乡饮酒礼，然后送到试院参加解试。<sup>④</sup>所谓“士人应举并须先赴乡饮酒，注籍给据，方许赴试，欲以革冒贯者”<sup>⑤</sup>。科举之年行乡饮酒礼于庠序，其实是在应举人参加解试之前的认定参试资格的仪式，用意在于革除科举考试中举子冒贯应试之风。三岁行乡饮酒礼以举士之制，实际上执行时间也不长，至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朝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正月辛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

②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70页。

③ [宋]王之道著，沈怀玉、凌波点校：《相山集》卷九《鹿鸣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④ 参见《宋史·选举志二》、《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八。《宋史全文》卷二一下《宋高宗十五》载：绍兴十九年十一月甲辰，“诏诸郡行乡饮酒之礼以取士。先是，司农卿汤鹏举请对，论举人多冒贯求试。乞于未下科诏前，令州县籍定来岁当应举人名，预先引保，委无伪冒，然后许赴乡饮酒。若临时投状射保者，并不收试。事下礼部，至是乃颁行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43页。

⑤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第1470页。

廷颁令罢乡饮酒礼举士之法。<sup>①</sup>士人虽不预乡饮酒者，皆许赴试。<sup>②</sup>废乡饮取士之法的原因，李心传认为：乡饮酒礼“凡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行之十余年，士人不以为便”<sup>③</sup>。因为乡饮酒仪式的酒食器用需要乡大夫、士之有力者资助，强制三年必须举行一次乡饮酒礼，则必然成为乡里士人的经济负担，“士人不以为便”也在情理之中。若守令积极于举行其仪，则必然造成“扰民”之事。在这种局面之下，朝廷强令乡饮酒的做法肯定要遭遇麻烦，很难定期举行。此外，孙应时撰《余姚乡饮酒仪序》中又云：“二十六年，或言吏并缘扰民，且预饮猥杂，反混士流。乃诏颁行于里社者听，官勿预知。自是，乡饮废矣。盖一时议者苟于改权臣之旧，而不之详也。”<sup>④</sup>由此探究，此事竟有微妙的政治背景：因为颁行乡饮酒仪制、用乡饮酒革冒贯的都是权臣秦桧，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便一反之，“乃宋代党争中的惯常做法”<sup>⑤</sup>。乡饮酒礼与科举制度配套联系的断裂，进一步明确了南宋乡饮酒礼概念的确定。绍兴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新通判抚州张洙奏议中既云：“且乡饮酒，所以明长幼之序，兴礼逊之风，当其与科举并行而不相悖。”<sup>⑥</sup>我们清晰看到，南宋乡饮酒礼的概念中已经明确不再包括州试之后举人于朝廷的“宾贡”仪式。这正是北宋以来“宾贡”仪式自乡饮酒礼概念中完全剥离出去的反映，也是乡饮酒礼的概念已经明确定位于尊老尚齿的地方宴饮仪式的反映。

南宋政权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乡饮酒礼之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功效，因此才有绍兴十三年颁行乡饮酒仪制的举措。尽管绍兴二十六年四月诏令，“其乡饮酒礼愿行于里社者，听从其便，仍不许官司干预”<sup>⑦</sup>，但“乡饮酒礼愿行于里社者，听从其便”也意味着朝廷对乡饮酒礼的推行仍然关注，只是为避免官吏“扰民”，才不许官司干预。至宋理宗景定五年，又诏郡邑行乡饮酒礼。<sup>⑧</sup>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重视

① 《宋史》卷三〇《高宗本纪八》。又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载，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左承议郎、新通判抚州张洙行国子监丞，张洙召对，乞士人虽不预乡饮酒者，皆许赴试。事下礼部，其后，礼部言：“今后科举欲并依旧法，其乡饮酒礼愿行于里社者，听从其便，仍不许官司干预。”从之。《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新通判抚州张洙言……。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乡饮酒”条却载：二十六年四月，始用新通判抚州陈泳之请，虽不与乡饮酒者，许应举。此中“陈泳”有误，乃应为“张洙”。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425页。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乡饮酒》，第282页。

④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〇《余姚乡饮酒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参见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山口智哉《南宋乡饮酒礼考》（收入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也认为，因为秦桧之死，“新政权马上开始否定他的政治，不难想象乡饮酒礼政策被认为也是秦桧政治的一环，应该废除”。

⑥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第1470页。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425页。又据《玉海》卷七三“礼仪”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诏行于里社者听之。

⑧ 《宋史》卷四五《理宗本纪五》，第886页。

乡饮酒礼的教化之功，又何以由唐代的公费变成南宋的酒食器具要乡大夫、士人资助呢？从宋代地方财政状况考虑，可能有所启发。由于中央增加对地方的征调，不断侵损地方，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已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州县财政亏空日见严重，尤其至南宋地方财政困窘的程度实在是令人诧异的。<sup>①</sup>地方州县财政大幅度亏空的局面，在南宋初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绍兴二十六年，右奉议郎鲁冲上书论事，就谈到他前任宜兴县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sup>②</sup>由此推论，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规定酒食器具要有乡大夫、士人资助，极有可能就是考虑到地方财政困窘的问题，不希望成为地方财政的负担。或许就因官方不提供经费，要求地方人士赞助提供，无法强制各个地方定时举行仪式，所以绍兴十三年乡饮酒仪制颁行之际，并无举行乡饮酒礼的明确时间，才有所谓“有该载不尽及难举事件，并各从其乡之便”的规定。这种经济因素的考虑，显然与推行礼仪教化、构建和谐基层社会秩序的目的有所背离。但是，正是这种经济因素的考虑，却让我们看到了对乡饮酒礼在具体推行层面的考虑，而不是如前代一般往往局限于礼文的修订而不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

各从地方之便，“不许官司干预”。由于失去了官府的强制干预或者推行，乡饮酒礼的执行力度也就因此降低，所以李心传以为乡饮酒礼“自是不复讲焉”<sup>③</sup>。郑樵《通志·礼略第三·嘉礼·乡饮酒》亦云：绍兴乡饮酒礼颁行之后，“未几而废”。郑樵卒于绍兴三十二年，《通志》一书在绍兴三十一年就全书告成。<sup>④</sup>编书之时也是经历了乡饮酒礼的颁行过程。按郑樵之意，绍兴颁行乡饮酒礼其实就是明州举行的仪制，而此乡饮酒“未几而废”的原因是“明州之士”不识“礼意”。郑樵认为明州仪制不是本《仪礼》而是本于《礼记·乡饮义》，是“不本全经”。换句话说，郑樵认为绍兴乡饮酒礼不行的原因其实就是“复古”不够的缘故。所以，应该本《仪礼》于古，参《开元礼》于今，综合历代损益而成之。然值得注意的是，与李心传等人叹息乡饮酒礼之“废矣”、“不复”相对应的，却是南宋地方官举行乡饮酒礼的事例不断出现。仅《宋史》就记载龚茂良于番禺、仇愈知明州、赵必愿知福州、洪天锡知古田县、孙子秀知金坛县、魏了翁知眉州等举行乡饮酒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乡饮酒礼在州、县皆有举行。此外，根据宋人文集、地方志、碑刻铭文记载，还可以看到南宋时期诸多遵行乡饮酒事例。尽管就整体而言，南宋乡饮酒礼的举行仍是少数地方官所为，并未形成稳定的体制，但与唐代朝廷屡次颁诏推行乡饮酒礼而州县正齿尚德的乡饮酒礼推行不力的局面相比，显然南宋时期的乡饮酒礼的实际推行无疑具有了明显增强的趋势。

①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6—168页。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第406页。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乡饮酒》，第282页。

④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点校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南宋时期,虽然朝廷有“不许官司干预”之令,但事实上在地方举行乡饮酒礼的事例中,多可见地方官积极筹划、主导其仪式,也有通过置田、拨款、筹钱等方式为乡饮酒礼的举行提供经费。此外,地方官亦往往参与乡饮礼文修订。南宋地方举行乡饮酒礼的诸事例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朝廷颁行的乡饮酒仪制条文是否保存于官衙之中以便按循行礼,已非重点。地方官或从古礼《仪礼》<sup>①</sup>,或参以开元及绍兴仪制<sup>②</sup>,或由熟礼之士相其仪,亦或访诸他郡所行仪制,皆可举行乡饮礼仪。重点往往在于地方官是否有举行乡饮之礼的意愿。与唐代相比,南宋地方官显然表现出了遵行乡饮酒礼的主动意识,而这种主动意识正是地方官群体社会教化意识增强的直接反映。此外,乡大夫、地方士人倡导请行、参议其仪,有力者资助器具酒食,更甚者“以相此仪”<sup>③</sup>,无疑是南宋地方乡饮酒礼举行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sup>④</sup>若无地方士人的响应和参与,即使有行礼之心的地方官也只能“独抱此志,未知所遂”<sup>⑤</sup>,无法实行。前文所述,由绍兴乡饮酒礼仪制规定中可见,绍兴乡饮酒仪制无疑更倾向于地方官府与地方士人合作而行的仪式,表明了对地方士人群体的“依靠”,而此正源于宋代以来地方士人群体的不断发展。这些地方士人比较熟悉朝廷政令的发布运作方式,左右着当地的舆论,成为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群体”<sup>⑥</sup>。他们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关注地方乡里事务的倾向,参与地方建设或公益活动,以开展人际关系或培养乡里声望。<sup>⑦</sup>绍兴乡饮酒礼文规定中明确了对地方士人群体的“依靠”,其中有经济资助的需要,更有对其熟悉乡里、左右地方舆论能力的借助。事实上,《宋史》列传中记载龚茂良、仇愈、赵必愿、洪天锡、孙子秀、魏了翁等于任职之地举行乡饮酒礼,其地区在宋代

① [宋]李昉等《文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广帅方右史行乡饮酒记》:淳祐四年,方大琮于广南行乡饮酒礼,宾佐与士人商讨礼文有与“《仪礼》颇不合”者,方大琮曰“吾从周”。于是议始定。

② [宋]刘宰《漫塘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九《乡饮酒仪序》:嘉定九年,金坛县令王君欲行乡饮酒礼,谓诸生云“乡饮礼废久矣,古典虽难尽循,开元、绍兴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

③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〇《余姚乡饮酒仪序》:嘉泰中,余姚县行乡饮酒礼,其时古礼今制皆无存,借助“熟其旧闻”的邑士莫叔亢“以相此仪”,其礼乃得行。

④ 关于唐宋时期地方官群体社会教化意识增强、地方士人群体发展与乡饮酒礼实际推行的关系,可具体参见拙文《乡饮酒礼与唐宋地方社会》(《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⑤ 胡石壁《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人伦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5—397页。

⑥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262页。

⑦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中指出,士人或家族透过领导或与人合作的方式,参与地方建设或公益活动,以开展人际关系或培养乡里声望,奠定经济与教育基础一样,是稳固、扩展或防止家族在竞争中失败的重要考虑和策略。诚然,人们参与任何活动或扮演任何角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彰显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功利倾向。不过,这只是一个面相而已;不能因此忽视知识分子回馈乡土、改造社会等更纯然的本质(第242页)。



多属文教兴盛、儒风浓郁之地。<sup>①</sup> 尤其明州能够多次举行乡饮酒礼,<sup>②</sup> 除了诸任郡守的努力之外,其地文化发达,儒风盛行,地方士人及其家族的积极参与,无疑是重要的基础。通过乡饮酒之仪式,地方长官、属僚及地方高德之士、地方士人共同列位其中,仕与未仕者皆排列其间,少长序拜以齿,在主献宾酬、序拜宴饮之间,建构起了本地士人群体的关系网络,地方士人的“乡党”感觉、“共属”意识不断增强。<sup>③</sup> 地方士人群体及其家族之间加强彼此之间的情谊和信赖,形成“地缘”同乡的共识。

绍兴乡饮酒仪颁行,以明州仪制作为依据。按《宝庆四明志》卷二载:明州旧制岁之元日或冬至日行礼,则绍兴乡饮仪制极有可能就是行于元日或冬至之日<sup>④</sup>。今考南宋地方举行乡饮酒的事例,其时间并不限于冬至之日或元日,亦有行于它月者;且有“因事行礼”的例子,或新学落成,或扩修学校,或修成贡院;亦有旌乡先生、饯行贤官长等因事而行者。<sup>⑤</sup> 南宋乡饮酒礼仪式举行地点,除了学校之外,还有行于贡院者。<sup>⑥</sup> 据文献记载对行礼盛况的评价,或云“合邑之士,无少长咸在,可不谓盛乎”,或云会者千人,或云“观者如堵,嗟咨欢忻,喜王化之复行”,或有云“六邑风动”,或有云“盍簪酬酢者三千余人”等等。这些记载或许尽有溢美、夸张之处,但是,以守令为主导的、以地方士人群体为主体的乡饮酒礼,已经成为南宋地方社会的儒林盛事,却应当无疑。

宋人谢维新曾言及:“南渡中兴之后,庶事虽草创而于乡饮之仪亦不敢废。岂不

① (日)山口智哉《南宋乡饮酒礼考》(收入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第238—253页)根据地方志和文集史料,将明州以外的南宋乡饮酒礼事例,进行列表分析,全部32例中,举行事例依次为两浙东路(18例)、两浙西路(6例)、福建路(3例)、江南东路(2例),此外还有淮南东路、成都府路、广南东路(各1例)。

② 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认为,四明是宋代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发达的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南宋文化发达地区,儒士数量多,儒学教育发达,因此能基本保证乡饮酒礼的举行。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考察宋代四明家族之际,曾指出,南宋时期乡饮酒礼举行,明州能够最早恢复其礼,并举行最久,历任郡守的知文守节,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是要继续举行,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像王伯庠、汪大猷、何炳、陈卓等四明望族,率领乡人积极参与活动,贡献才力,无疑是更重要的推动力(第154页)。

③ (日)山口智哉《宋代乡饮酒礼考——礼仪空间としてみた人的结合の〈场〉》(载广岛史学研究会:《史学研究》241,2003年)认为,原为交流“场”的乡饮酒礼,形成了宋时作为讲学等学术交流“场”的土壤。《南宋乡饮酒礼考》认为,南宋乡饮酒礼,不仅仅是以学校成员为对象,也定位为地方士大夫的集会。“明州乡饮酒礼在地方学校举行,但是仪礼体现出来的秩序的空间确实是‘乡里(所生)’,不分有官无官的地方士大夫在这个场所中按年龄确认秩序,意识到‘乡党’伙伴的感觉”。这种仪式是按照年龄确认秩序,“提高共属意识”。

④ 绍兴十九年至绍兴二十六年之间行乡饮取士之法,则其乡饮酒礼当行于解试之前。

⑤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〇《余姚乡饮酒仪序》载:乾道间余姚“乡先生叶君汝士仕而归老,邦人高之,请于大夫,特举是礼以宾之”。其后,嘉泰中又因知县常禧、赵善湘先后满秩离任,皆行其礼、饯于学。

⑥ [宋]郑瑀、方仁荣撰《景定严州续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载,嘉定十一年,严州知州郑之悌行乡饮酒礼于贡院,会者千余人。

以尊尊老老人心之所同，不如是则无以示天下入孝出弟之教。”<sup>①</sup> 其言正反映了在南宋政权不断面临外来压力之际，对乡饮酒礼明长幼之序、稳定基层社会功能的重视。由于地方官的策划主导以及地方士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南宋乡饮酒礼在地方的遵行情况明显好于唐代以及北宋。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乡饮酒礼，无疑已成为南宋社会中公认和推崇的彰显礼仪教化、维系社会秩序的仪式，或者说是一种象征。

礼仪的发展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复古与适时是矛盾结合体。正是在复古与适时的相互作用中，古代礼仪传统延续下来。唐宋乡饮酒礼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正是一个复古与适时综合作用的过程。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乡饮酒礼的“宾贡”职能凸显，从而一度独专乡饮酒礼之称号。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宾贡”仪式渐趋演变成为科举制的配套仪式“鹿鸣宴”，逐渐从乡饮酒礼的概念中剥离出去，而乡饮酒的涵义明确固定为以基层社会的尊德尚齿为主旨的礼仪仪式。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乡饮酒从古礼经典正式进入官方礼典，并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为地方社会所关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儒林盛事，成为标志和带动地方礼仪教化、文化风气的仪式。由唐至宋，朝廷对乡饮酒礼教化乡里、尊德尚齿功效的关注渐趋增强，正是源于朝廷对基层社会礼仪教化、社会控制加强的需要。这也正是我们试图从长时段“过程”动态地剖析乡饮酒礼的变化轨迹之时，需要关注的内容。

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礼制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9CZS003。

作者附注：本文的修改完成，承蒙审稿专家惠赐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王美华（女），1973年生，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9年6月20日

<sup>①</sup> [宋] 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二《乡饮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